

一十年精选

新周刊

SINCE 1996

《新周刊》杂志社 编

人生太短，
只够相爱

《新周刊》情爱观

／
本
／
杂
／
志
／
和
／
一
／
个
／
时
／
代
／
的
／
体
／
温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新周刊
NEW WEEKLY
《新周刊》杂志社/编

人生太短，只够相爱

《新周刊》情爱观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生太短, 只够相爱: 《新周刊》情爱观 / 《新周刊》杂志社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 8 (2017. 7重印)
ISBN 978-7-5360-8057-7

I. ①人… II. ①新… III. ①爱情—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D66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8415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杨淳子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志涛

书 名	人生太短, 只够相爱: 《新周刊》情爱观 REN SHENG TAI DUAN ZHI GOU XIANG AI XIN ZHOU KAN QING AI G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2 1插页
字 数	260,000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3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前言

《新周刊》显然是一本很特别的杂志，但它的特别之处到底在哪里呢？下面两个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一个就是1998年5月的时候，创刊还不到两周年的《新周刊》给自己所做的一个定位：“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虽然一直都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狂，虽然到了2014年，“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的提法变成了“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但其中的关键词却保留了下来，那就是“新锐”。

说到“新锐”这个定位，《新周刊》创办人、执行总编封新城有一句比较权威的话可做诠释，他说：“新锐构成了《新周刊》杂志品牌基因的源代码。它准确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心态，也准确地表达了以《新周刊》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媒体所做的突破性举动与特性，所以马上就成为了流行词汇。这个概念迅速地扩大开去，形成对一种新生的成长中的力量的通行表述，这是一种非常符合跳跃式发展的社会所渴望和提倡的力量。”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说法也是封新城提出来的。2001年《新周刊》创刊5周年之际，封新城觉得“新锐”这个说法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世

界观,还有必要在方法论的层面对这个“新锐”做一个可操作性的延伸。于是他提出了所谓四个“商”的经典概念:观点供应商、资讯整合商、视觉开发商和传媒运营商。这个说法刚出来的时候,业界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仿佛一个传媒人把自己定位为商人有点不靠谱。但封新城这四个“商”内含的诉求其实很清楚,就是“新锐”的《新周刊》不应该仅仅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做新闻的杂志,而应该像一个商人一样去打造和经营《新周刊》这个品牌,用合乎传播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创新方法,去创造价值——新锐的价值观。

时至今日,15年时间已经过去,当年《新周刊》在资讯整合以及视觉开发上所开创的一系列新方法和新路数——如它乐此不疲地造出的五花八门的各色榜项,如年终大盘点中的感性而性感的十大条目,如篇幅巨大且细节丰富的图片报道,等等,在传媒界已经成了常规套路,而其在传媒运营方面的诸多尝试,也融入到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的创新浪潮之中。但是,唯有观点供应商这一定位,始终是《新周刊》独树一帜的标签,也是《新周刊》这一期刊品牌20年来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那么,什么是观点供应商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贩卖观点而不是传播资讯,就是某种基于新锐理念而形成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就是某种包含着既无畏向前又批判调侃精神气质的社会洞见,就是某种概念加趋势观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的表达。这些观点未必一概准确、一概正确,也未必都很权威,但它一定是新锐的,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是带着置身于社会浪潮中的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困惑、不满、愤怒和感动的情绪的,是透着这个时代体温的——《新周刊》后来的那句著名的广告语“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体温”就是从这里来的。

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走过20年的《新周刊》,为读者提供了473期有温度、有态度和有一定深度的杂志、100多本图书、40多场各类颁奖活动,更为我们这个纷繁多变的时代提供了一系列可以作为社会学样本留存的话题、观点和概念。从早期的“她世纪”“第四城”“飘一代”“弱智的中国电视”“回到常识”“向知识分子致敬”等,到后来的“有一种毒药叫成功”“民国范儿”“急之国”“悲观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等,这些《新周刊》所制造的话题、提出的原创概念和观点,涉及这20年来中国社会之城市、财经、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某种意义上都早已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它们是我们几代人集体记忆的重要标签,铭刻着时代前行的印记。

对此,著名策划专家王志纲曾评价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新周刊》捉住了中国媒体的一个空白点,以比较另类的方式捕捉住了时代文化的脉搏和刺激点,并用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表达己的观点,这是它能成功的原因。”

《新周刊》副主编 周可

2016年8月3日



我爱你

ISSN 1007-7006
9 771007 700002

新周刊
NEW WEEKLY

我爱你!

图说中国爱情

二十年来中国爱情线索

中国爱情关键词

18部经典爱情电影

20世纪最打动大众情

北京 1月 7

中国多情人

永远的情歌

东渡西归：浪漫好去处

闻香识情人

内含情人节消费优惠券

想起《新周刊》 想起“我爱你”

● 封新城

1997年9、10月份,我有个想法想做《图说中国爱情》,这在当时是很新的。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报道样式,以时间的演进为中国爱情找到某种线索。到1998年年初,我们在为情人节找选题的时候一下子就想到了它,于是就有了这一整本的爱情特辑。当时的情人节只是商家得利,传媒少有《新周刊》这样的魄力去关注新生现象,以这样大的篇幅报道。当时我们处于品牌的初创阶段,而《我爱你》对品牌形象的塑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阶段性的亮点。此外,无论是对中国爱情特点的剖析,还是爱情调查,都体现了《新周刊》是使用时尚元素最好的杂志这一特点。

专题的成功很重要的是在于卖点和包装上。封面中间的唇印比拟爱情关系,而“我爱你”那三个字是最重要的。当时我忽发奇想:是否可以在封面上写上大大的“I Love You”,马上有同事说不如直接用中文,于是就有了这个大大的“我爱你”,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三个字买的,甚至有人拿这本杂志去求婚。2000年的《爱情之死》是这个品牌的延续。20年来,国人的爱情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观和价值观的变化。传统的东西正随着社会演进、变革而瓦解,例如人们质疑爱情的永恒。作为社会观察家的《新周刊》,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情爱变化的肌理和轨迹,每年一度的情人节特辑成了年度中国情爱变化的晴雨表。

我希望人们想起《新周刊》的爱情观就想起“我爱你”,这句世界上最美好、最温柔、最触动人心的话。

你知道“我爱你”有几种说法吗？

● 邓娟

“在古代，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有感于现代通信便捷而爱情表达却迟钝，擅长说话之道的蔡康永在微博写下76条“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现代人有时候不懂表达。《非诚勿扰》某期节目讨论爱情语言，女嘉宾争奇斗艳，用上了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但来来去去不过是对中文“我爱你”直接翻译。1960年代生人的黄菡补充了两个版本：如果表达I love you，张爱玲会说“原来你也在这里”，读红楼梦的刘心武是“这个妹妹我见过”。一旁的宁财神接口补上一个鲁迅版：吴妈，我想和你困觉。

这三则背景不同、身份各异的爱情表达范本，都来自白话文的贡献：《红楼梦》是古白话，而鲁迅和张爱玲是现代白话文写作的翘楚。

“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写道。

如今，我爱你的情境发生更符合愚人节而不是情人节。爱情的表

达是千篇一律铺满鲜花和蜡烛的“十动然拒”，是爱无能、情无趣。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白话文运动第七年，郁达夫借《沉沦》喊出一代人的情感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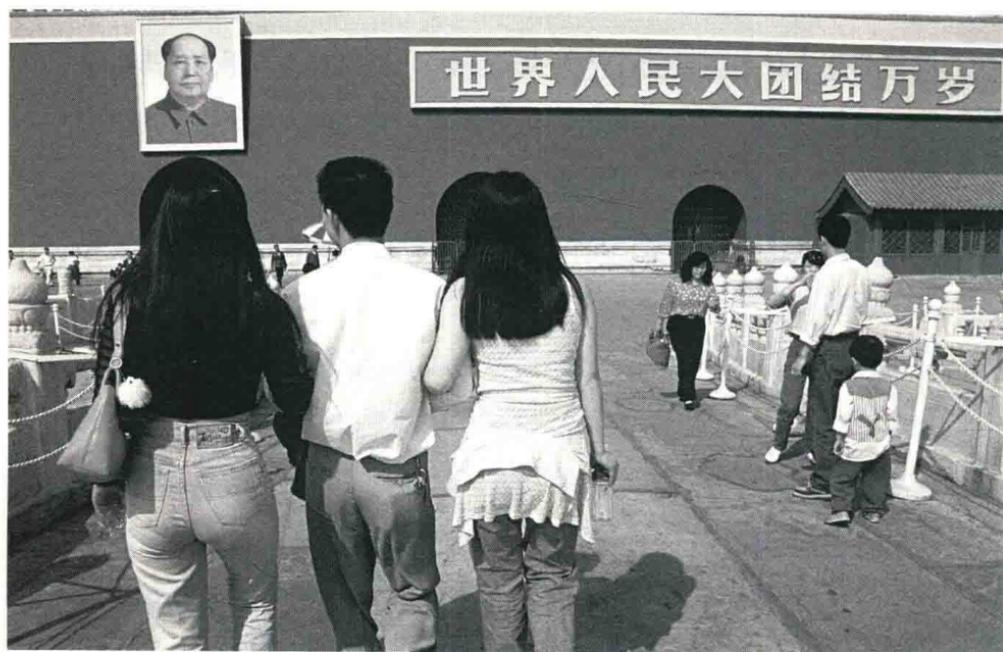
年轻人是爱情先锋队。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曾为《新青年》撰文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点拨学生：“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

白话文时代的爱情表达不再是“一方素帕寄相思，横也丝来竖也丝”的猜谜语。白话文运动最盛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民国四大情书”经典。

当鲁迅与许广平异地谈情，这位正经的先生对前女学生、现女朋友表忠心：“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这些信后来结集为《两地书》，鲁迅在自序中称：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不外乎是对学校风潮、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信笔写来。

当徐志摩示爱陆小曼，最最新潮的读者恐怕也脸红心跳：“龙龙，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我唯一的爱龙，你真得救我了！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样过的，一半是痴子，一半是疯子，整天昏昏的，闷闷的，只想着我爱你”；“龙呀，我想死你了，你再也不救我，谁来救我？”

当朱湘隔着太平洋想念刘霓君，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也焕发崭新爱情的活力：“你说我的信很可爱，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所以



20世纪90年代,天安门城楼前一景。(图/曾忆城)

我写给你的信也跟着可爱了。”

当沈从文苦恋张兆和：“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在“四大”之列的朱生豪，虽被朋友笑谑为“没有情欲”的木讷书生，言情起来却比谁都极致——“我是宋清如（朱妻）至上主义者”。

浪漫春光苦短，战争以不可控力洗劫爱情格局。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模式不是我爱你而你恰好也爱我，而是先结婚后恋爱开展革命伴侣生活，当漂亮的文工团女演员被分配给一个个胡子拉碴的“石光荣”，能够说的也只有“服从组织安排”。

表达越来越直接，表白越来越随便，约会变成约炮，爱情变成色情。

20世纪50年代，爱情打着友谊的旗号，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正义凛然。当志愿军467部队一分队的胡应龙通过书信与战友介绍的小学女教师何杏菊联系，自我介绍程序是家庭成分、工作经历、党员关系然后才到个人兴趣。第一次约会的讨论话题关于“今后友谊的发展和巩固”，第17封信终于互相去掉了同志称谓，第21封信惴惴不安的男人委婉表白，措辞是“向组织上提出关于我们的事情”。第34封，男人追问她信上“一个幼稚的她的心似乎已经献给他了”中他和她究竟指谁，还撒娇让女人不许回避。而通信10个月后，深陷爱情的男人总算在第45封信表达：让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亲爱的，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请相信我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60年代，政治强行介入爱情的表达方式，“一等姑娘嫁军人，二等

姑娘嫁工人”成为主流爱情观。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心上人开口是《毛主席语录》，出手是《毛主席诗词》，允许夹带的私货最多是在扉页上落一句积极向上的祝词。

20世纪70年代，当爱情随着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河边、打谷场、苞米地，爱情是冲破围栏的你依我依。但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回城的知青，多年后回头想想村里的小芳，爱情的缅怀只能是“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的冠冕堂皇。

终于，挺进了理想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爱情跟随政治、经济开展深刻反思，女作家张洁以第一人称写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掷地有声，宣告了婚姻必以爱情为基础，否则注定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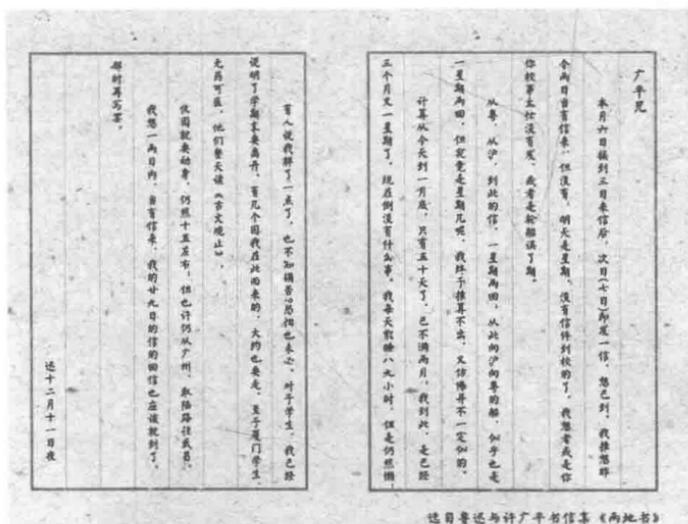
1982年，当23岁的文学女青年爱英给她崇拜的杂志编辑欧老师写信，在一番“读完你推荐的《金粉世家》，自觉不及《红楼梦》”“你批评琼瑶的小说庸俗，我却认为它细腻优美”的文学交流之后，她初表情意：“我还是决心像你希望的那样，多看世界名著。我想，这样就能离你近一些吧。”

这名自觉配不上文字工作者的护士以朴素的语言表示爱情决心：“亲戚朋友的压力大得让我喘不过气来。在我看来，你33岁不重要，你离过婚有一个儿子也不重要，只要让我感到值得。”23年后，当他们的女儿在床下木箱翻出这些泛黄纸张：“我的眼泪哗哗落下来。1982年的妈妈和我如此相像，天真、敏感，对感情过于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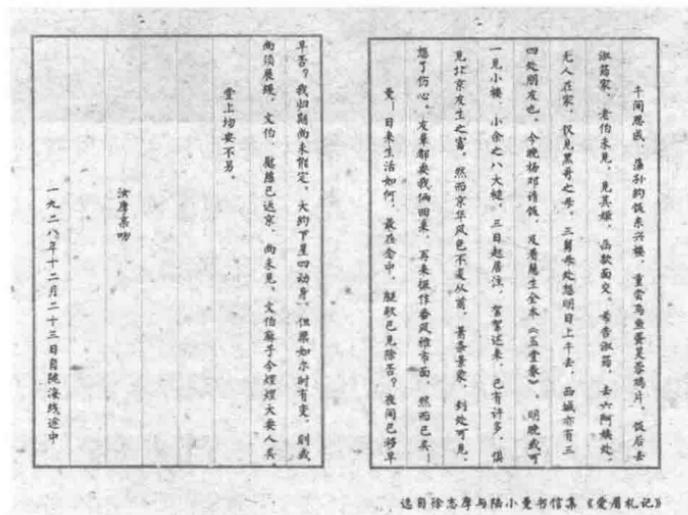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爱情是从港台传过来的流行歌曲，语言表达不再“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我和你吻别”，是“爱要说，爱要做……不要反反复复想得太多”。

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想得更少，做得更多，表达越来越直接，表

白越来越随便。一颗爱心、一张红唇、一朵玫瑰的表情符号，就取代了语言的丰富之美。终于，约会变成约炮，爱情片成为动作片，等发觉还有真爱，用尽搜索引擎，秀遍各国语言，表达的不过还是三个字：“我爱你。”



这目鲁迅与许广平书信集《两地书》



这目徐志摩与陆小曼书信集《爱月札记》



公园一直以来都是恋人们首选的约会地点。(图/张海儿)

中国爱情关键词

◎ 周可

搞对象

“对象”原本是一个哲学词语，表示客体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又与人的存在相关联的某种规定性。“对象”从哲学词语变为成为一个爱情或与爱情有关的词语，绝对是当代中国人的发明。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谈情说爱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因而“搞对象”一词便流行开来，几乎成了“谈恋爱”的代名词，以其一本正经的事务性和目的性取代了风花雪月的谈恋爱。但它之所以能够大面积地流行开来，恐怕还是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心态有关。一直以来，中国人一提到谈情说爱一类的事情时，总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想说又不好意思明说，于是就大用特用修辞手法上的“借代”。不过，今天再提起这个词，就要被年轻人认为“老土”了。

第三者

中国把婚外恋对象称为第三者，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之前，为数不多的婚外恋被人很难听地斥为“乱搞男女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至上的国度里，婚外情是绝对被否定并禁止的，当事人